

# 「臺灣民主發展史系列講座」： 楊翠、吳乃德

嵇國鳳 國史館修纂處研究助理

國史館去（102）年與中國近代史學會合作，舉辦「臺灣民主發展史系列講座」，邀請 10 位學者專家蒞館演講，從學術的、歷史的與多學門的角度出發，不分黨派色彩，深入剖析臺灣民主化過程中涉及的政黨、政商、族群、文學等議題，重新審視臺灣民主發展艱辛路程，深化臺灣民主化的歷史認識；同時冀望學術研究成果，能藉此演講活動走入社會。

本期刊登最後兩場次楊翠、吳乃德兩位教授演講紀要，本系列講座各場次時間表暨其他各場次內容詳見本刊第 4、5 期。

## 楊翠：文學的介入與反抗—— 戰後臺灣文學中的威權體制與 民主意識

楊翠女士，現為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副教授。本次演講楊教授試著透過臺灣作家的



楊翠教授（攝影／陳世局）

文學作品與生命經驗所交疊出的反省，梳理戰後臺灣文學與政治間的關係，兩者如何產生關聯性，以及文學與現實政治衝撞所產生的緊張性與反抗意識，進而積累成為一股推動政治、社會生活改革的精神源泉與行動力量。

政治對文學的介入，以戰後臺灣而言，白色恐怖時期來自於體制內的壓迫與操控，可說是鋪天蓋地，文學家對政治的迫切反應，大多不是出於對政治的熱衷；相反的，不少文學家厭惡政治，卻又不願束手旁觀，於是本著對人、對社會的關懷，轉而透過文學創作，表達反抗意識。儘管文學無法有效地解決當前的政治問題，但可以透過提出問題，讓問題被看見與傳遞。文學家始終相信，敲擊政治的能量，必須經過長時間的積累才能引起注意，甚至獲得解決，而成功不必在我。楊翠教授援引沙特所提出的「介入文學」（engagement literature）及李喬「反抗哲學」的概念，藉以呈現一種責任的、參與的文學特質，在逼視苦難本質後，便以具體的反抗行動彰顯其實踐信念，以及捍衛生活的政治意識。唯有全民都具有政治意識，政治，才能真正成為「眾人之事」。

楊翠教授透過楊逵、吳濁流、柯旗化及施明正等幾位作家的作品，觀察其各自的生命史與臺灣歷史交疊出的苦難，一方面赤裸地呈現政治對文學家的箝制，個人無所遁逃於體制性的暴力，以及必須忍受社會的孤立。白色恐怖時期體制性暴力，依賴的是一

整套綿密的監控網絡、龐雜的情治系統、繁細法令等，在國家暴力機器嚴密的籠罩下，個人的苦難絕不會僅止於個人，而是每個人都得面對整體結構性的威逼。尤其相關法令的制定，如三大「非常法制」——戒嚴法制、總動員法制、動員戡亂法制，「法」成為威權體制迫害人權正當性的依據。楊翠以其祖父楊逵為例，作為一位文學家，也是一位跨世代的臺灣社會運動者，在戰後與「祖國」的交會中，如何由期待轉為失望的心路歷程，進而寫下對於國民黨政權的種種批判及「哭民國不民主」、「哭言論、集會、結社的自由未得到保障」的斑斑血淚，所標誌的自由精神與爭取臺灣民主的渴望，在在皆表達出楊逵對自我理想的堅決與赴死覺悟的生命選擇。吳濁流、柯旗化及施明正的作品中，透過對二二八事件的闡述，意欲與臺灣政治現實對話與反省，尤其作品內充滿對國家暴力的指控，他們以文學作為媒介，想像並批判威權體制，在描繪黑暗現實之際，其實暗藏著突破現實格局的無限慾望，並開展出屬於文學的力量，也就是李喬所謂「文學是苦難與救贖的火炬」，一把為閱讀者精神救贖上引路的火炬。此一類型的政治受難小說，之所以在1970、1980年代大量湧現，除了是作者當下時代氛圍的影響外，更可能是其成長過程中所遭遇的政治影響，透過寫作作為生命的出口，渴望自由、平等與人權。

另一方面，在苦難與權力的壓迫下，更

令文學家們看清臺灣威權體制的運作模式，這讓一整代的臺灣人民在精神上，矗立了一座揮之不去的思想牢籠。這也使得文學家所背負的歷史責任，是跨越個人經驗，試圖傳遞一群有著共同生活處境的人，如何受到威權體制的壓制，及其身後所留下無法忘懷的，集體生命經驗的映照。倘若歷史的解釋權，總在政治權力的折衝裡不斷被擺弄與傾斜，那麼文學似乎是較能柔軟地、或以隱喻的方式，穿透政治的禁忌，為歷史作見證。這幾位戰後臺灣的文學家們，各自代表一種用筆反抗政權的精神面貌，訴說著文學與政治之間永恆的緊張關係。當政治以高壓的樣貌出現之時，必然有一枝筆是為了抵抗而不斷書寫的，這樣的文學作品往往因為具有厚重的時代關懷，更能敲擊人心。楊逵、吳濁流、柯旗化及施明正等文學家在出獄後，仍堅持其理想、並持續以作品或行動表達與政治現實的拉扯拔河，他們並非不怕死，而是忠於一個價值的選擇，楊翠教授稱之為「玫瑰與烈焰的對決」，即是「威權體制的罪惡，猶如烈火焚燒，為人民帶來無盡的苦難；而玫瑰象徵人權文學謳歌而出的果實，烈焰的罪惡與苦難之火，以文學提煉，終將成為芬芳的玫瑰。」

## 吳乃德：轉型正義與民主文化

吳乃德教授，現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。本次演講主要探討國家從威



吳乃德教授（攝影／黃翔瑜）

權向民主轉型後，社會該如何面對過去威權遺產的難題——「轉型正義」（Transitional Justice），並從國外的例子以及臺灣的情形，告訴我們轉型正義從理想走向實踐的過程中所遭遇的衝突、影響及其建立的價值。

在 1980 年代開始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，至少有 80 至 100 個國家從威權走上民主，他們都共同面對轉型正義的問題，一個簡單的概念，卻包含極複雜的政治過程。轉型正義的理念乃是一個社會為了處理過去制度性、大規模侵害人權所做的回應，以及在過程中所建立的程序和機制。其目的不僅在尋求受害者被認知，也在確立責任歸屬、獲得正義、達成和解，並成就和平。首先，在獲得正義的程序上，主要朝向以民主法治的方式來成就正義，透過審判、正當的法律程序來呈現歷史真相。同時，以民主教育的素養與文化態度，持平面對轉型正義，有助

於跳脫二次世界大戰後報復式情境下的歧視性懲戒心態與作法。

儘管由法律程序的審判最合乎正義原則，但在執行上也最為困難，各國各有其不同的民主轉型模式與政治難題。在現實政治的制約下，其國家內部威權統治的遺緒，仍在轉型正義的執行過程中，不斷地侵擾與拖延正義的執行與裁量。因此，如何追求轉型正義便受到兩個重要因素的影響，即：一、特定的政治情境，包括民主轉型的模式（例如：東歐的革命、或南非的妥協）、轉型後的勢力分布（仍由舊有的軍人或威權政黨繼續執政）。二、政治菁英的意識形態，也會影響轉型正義的實踐方式。（例如：阿根廷透過公開審判，對全體公民進行的憲政教育。）

雖然透過司法程序來伸張人權是轉型正義的主要工作之一，但吳教授同時也提醒，僅依賴司法來解決關於轉型正義的一切問題，極可能出現以下的盲點，例如對加害者的審判，必須將全盤的體制運作與特定的歷史情境列入考量，並思考司法是否可能過度簡化歷史的複雜性，將社會只分為兩種人：加害者和受害者。為了在轉型正義與歷史真相之間尋找妥協的可能，因而設立「真相與和解委員會」（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），其對加害者採取追訴與不追訴的中間路線，即不追訴，但仍可讓真相廣昭於世。委員會的任務，是讓受害者獲得尊嚴與賠償、防止暴力及侵害人權事件再度

發生，並嘗試為分裂的社會創造和解的可能。以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為例，其特色有：一、以當事人「完整交代罪行」換取特赦，因為追訴的界線既然難以劃分，報復式的懲罰也不能帶來和解，只會造成社會更加緊張與分裂。二、舉辦公聽會，即所謂的「建制」，對司法、媒體、政黨、商團等團體舉辦公聽會，透過對體制的追訴，突顯當時的社會組織在不義體制下的作為，以及政府透過何種方式、哪些人、使用何種資源控制社會組織。其目的並非為指認出單一的受害人或加害人，而是嘗試去了解這些團體與機制在種族隔離體制中的角色，並給予每個團體建制自我反省的機會。

臺灣在民主轉型之後，國民黨仍以威權遺緒的狀態，繼續統治國家，迎上民主化浪潮的同時，一面也錯失了處理轉型正義的黃金時機。同時臺灣政治壓迫的高峰期是1950至60年代，距離2000年民進黨執政達四十年之久，道德上的義憤填膺，已經隨著時間的消逝而被逐漸淡忘。於是乎臺灣轉型正義的「特色」，大致有以下數點：一、有上萬名受害者，卻沒有加害者。二、加害者受到民主政府的獎勵。三、官僚化的加害體系。臺灣行政式的加害體系，屬於一層又一層的體制內的加害模式，即便如此，就算在體制內，仍需考量執行者的道德責任與裁量空間。例如刑求的必要性，究竟是一種執行者主觀情緒下自我方式的洩恨？還是依循體制內的奉命執行？吳教授認為，臺灣在

轉型正義上做得最好的工作，只有在受害者的賠償方面，不過，賠償等相應作為，幾乎都是由人民或民意代表所發動，政府才被動地配合處理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發動賠償的民意代表涵蓋所有的政黨，顯示臺灣社會對戰後「歷史上的錯誤」有所共識。但有待努力的地方是，加害者責任的追究仍屬空白。如何再去反省與建立歷史真相，是一件很重要、也極為困難的政治與道德工程，在威權體制下執行迫害的絕不是少數人的責任，而是很多人在體制下所豢養出的威權社會型態。因此，民主化後的臺灣社會，該如何追尋和解的途徑，並不只存在於加害者與受害者之間，而是整體社會和解態度的養成，在互相理解下進行溝通，使雙方有平等的自白空間，同時對於在絕對人口數值下的少數受難者設身處地的理解，兩者共同努力下，才能創造出有助於和解氛圍的最大可能。

## 出版資訊



## 回睇世紀路—建國百年歷史講座

主編：呂芳上

編者：謝培屏

2012年12月初版

精裝 300元

國史館為慶祝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周年，從民國100年8月至101年8月，特別邀請14位國內外知名歷史學者，進行一系列的專題演講，定名為「回睇世紀路：建國百年歷史講座」，講座規劃從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思想、文化及世界史等不同專業領域和角度，對百年歷史發展進行整體觀照、反省與檢討，以彰顯百年來歷史發展的特色。

訂購詳見「國史館出版品訂購處」  
(頁296)